

温州制造业六成破产虚实

虽然准确数字无法确认,但制造企业倒闭名单不断增加却是不争事实。在此背景下,前七月温州金融业税收同比仍增长67%。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温州企业极度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温州最新的国家级的滨海工业区走一圈就知道了。”

“工业区里又是一个资产上亿的企业破产,被银行接管。”

“一个资产上亿的大老板,流动资金还不上几百万的贷款。在温州现在是常态。一旦银行断奶,一夜就会破产。”

……

微博在不断爆料更多有关温州制造企业的结局,温州制造业似乎岌岌可危。

近来,温州制造业60%将破产的传闻不脛而走。温州,这个依靠制造出口行业与超常规地下金融发家的城市,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黯然失色。

企业倒闭潮再现

今年5月,台州最大出口船舶企业金港船业提交破产申请;之前,宁波蓝天造船集团和年造船能力100万吨左右的宁波恒富船业有限公司先后倒闭;9月5日,国内第一家在伦敦上市的温州船企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又发出寻求资产重组或资产转卖的公告。

10月6日晚,上海维多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健新浪微博称:“2011年底温州瑞安市流传十来家企业存在严重的资金风险,果然几乎全部被流言所击倒——崩溃破产,今天又收到第二批风险的企业名单短信……一旦如此瑞安市的经济真的是元气大伤,后退十年难以确定。”

从网友“唐舒尔茨”一条关于温州鞋厂破产的微博,到耸人听闻的“温州制造业约60%将破产”之说,受国民经济持续萎靡影响,各行业发展状况均不理想,传统制造业更是陷入经营困境无法自拔。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马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作为国内重要的传统制造业基地,温州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并非空穴来风,此现象符合业内普遍预期。

官方数字印证了目前温州的经济现状。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更是位列全省11市之末。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邓燕飞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从温州当地的统计数据来看,6、7、8三个月,温州的出口总额同比都是下降的,且7、8月份的下降幅度都在8.5%以上,9、10月份的数据还没看到,但据此趋势来看,可能也不太乐观。温州是偏外向型经济结构,



作为国内重要的传统制造业基地,温州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并非空穴来风,此现象符合业内普遍预期。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

今年1至7月,温州金融业税收为20.85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居各行业首位。学者指出,将金融业高收入纳入对GDP增长的贡献是错误的,金融业的收入越大,意味着它在以更纯粹的方式剥夺实体经济的利益,而不是更好地在为实体经济服务。

外部市场对当地经济有严重的制约作用。不久前,IMF发布的公报称全球经济增长下滑,这一宏观背景和温州当地的实际状况“不谋而合”。

与宏观经济向好“不协调”

10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召开行业协会负责人、部分地方部门

和企业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三场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意见和建议。

从座谈会上与会人士反映的情况看,三季度尤其是9月份以来,出口逐步回升,消费稳定增长,物价涨幅明显回落,就业形势良好,结构调整迈出新的步伐。

9月制造业PMI为49.8%,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这是5月以来首现回升。更为重要的是,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达到49.8%,比上月回升1.1个百分点,是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呈现持续下降走势。

从各行业、企业、地方部门等相关方面传递出的诸多信息看,当前经济出现了积极变化,经济增速趋于稳定。

而温州制造业的萎靡与宏观经济整体向好的表现形成了对比。马遥对记者表示,宏观经济向好与否是由诸多经济数据决定,而与微观经济发展指标有不小差别,二者之间出现“不协调”也很正常。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尚未出现企稳回升迹象,各行业仍陷入困境无法自拔,经济复苏势头不够明显,维稳的难度依然存在。

邓燕飞认为,从温州当地金融机构的贷款情况来看,短期贷款的同比增长幅度大都在14%以上,而中长期贷款同比则下降得厉害。因为从统计上难以获得温州当地企业的社会融资总额,据此并不能完全判断温州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但温州其他融资方式并没有较大改变,所以基本上可以将当地的融资总额看成一个定数,在此假设前提下,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实体经济的悲观事实。

当然,最大的悲剧可能当地政府

还没有发现,却反倒当成好事。据温州当地的官方媒体报道,今年1至7月,温州金融业税收为20.85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居各行业首位。学者潘英丽指出,将金融业高收入纳入对GDP增长的贡献是错误的,金融业的收入越大,意味着它在以更纯粹的方式剥夺实体经济的利益,而不是更好地在为实体经济服务。

企业“活下来”法宝

什么才是解救垂死挣扎的企业良方?这是困扰众多温州制造企业的实际问题。

马遥认为,“低附加值+价格战”是我国传统制造业生存的重要“法宝”。多数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赚取微薄利润。地方政府应积极出台举措,从税收、土地、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传统制造企业涉足产业链更多领域,提高产品附加值,尽快走出困境。

邓燕飞也认为,高附加值和低成本永远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高附加值和低成本看似矛盾,其实也可以相互融合,关键看企业如何创造性运用和把握。”邓燕飞告诉记者,企业应该对“高附加值”正确认识,不能单纯地认为“高附加值”就是多添加产品的功能,一双鞋、一个打火机、一个剃须刀,这些产品的附加值不需要也不宜太多,事实上,能把最根本的“一个价值”做好并坚持下来就能帮助企业长青。

邓燕飞表示,温州依托金融业来支撑经济增长,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中介对资金的调剂,但金融必须围绕实体经济转,而不是喧宾夺主。

深圳劳工 NGO 遭逼迁 无良企业或为背后推手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现在劳工 NGO 的生存环境普遍不好,主要是身份和所做事情得不到政府认可。而劳工 NGO 被逼迁的背后,有无良企业的推手存在。”10月20日,深圳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工 NGO 组织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该人士称,劳工 NGO 在替员工维权、调解劳资纠纷时,必然会触动企业的利益,因而被打砸、殴打、恐吓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替别人维权的同时自身权益却难以保障。

近日,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手牵手友友活动室等十余家劳工 NGO 先后遭当地多个部门上门检查,紧接着房东断水断电,以各种理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搬迁,甚至出现暴力逼迁,从而导致这些劳工 NGO 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现象:劳工 NGO 之困

10月19日,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负责人张治儒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张治儒向记者介绍,1993年他南下打工,体会到外来工遭受的种种不公对待,且工人不懂法又没钱聘请律师维权而导致维权结果不理想,加上自身受工伤却维权失败,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外来工协会为劳工提供服务 and 帮助。该协会成立于2004年3月,后因一直未能够通过民政合法注册,便于2005年5月1日通过工商注册成立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要为外来工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培训、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公益性服务。

张治儒说,春风服务部是这次遭打压的第一个。因为春风服务部是国内最敏感的劳工机构,所以刚开始以为只是针对春风的单独行动,但没想到此后的几个月中,接二连三出现对其他劳工机构的打压。

“我们在松岗的办公室刚租不到三个月,房东就通知要求搬迁。但由于房东一直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拒绝搬迁。最后房东没有办法,就只得通过暴力解决。”张治儒说,“在2月份,房东叫了好几个人,在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将我们的招牌和卷闸门全部拆掉。报警后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得搬迁。”

“到现在为止,房东连押金都还未退给我们。我们现正在准备起诉房东。”张治儒说。

在深圳,像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手牵手友友活动室这样的劳工 NGO 有十余家,主要分布在宝安和龙岗两个外来劳工比较集中的区域。而目前广东全省大概有50多家劳工 NGO,维权人士就有200多人,坊间一度盛传多达上千人。

调查:逼迁背后有企业推手

对于劳工 NGO 存在的作用,张治儒表示,深圳很多企业反映,正是他们这些劳工 NGO 的存在,让很多工人学会了通过投诉、起诉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很多企业老板认为现在的外来工权利意识太强”。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工 NGO 负责人还向记者表示,压力不仅来自无良企业,现在政府对劳工公益机构比较不信任,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担心劳工 NGO 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劳工公益机构没有合法注册,特别是在民政部门注册,造成法律和行政上的监管缺失。

“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从事这项活动,如果说要查你,就太容易了”。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劳工 NGO 在筹款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帮扶工人的无数个案例中,张治儒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述了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个案子。其中,黄文松工亡获赔85万,创造全国工亡赔偿最高案。

张治儒同时猜测,也许是 NGO 组织帮助工友维权,引起基层职能部门猜忌。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事件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但截至发稿前未得到任何回应。

争议:公益还是幌子?

不过,对于劳工 NGO,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是对劳工 NGO 的目的、维权方式和效果提出质疑。

质疑者认为,劳工 NGO 的负责人和组织者大都学历层次低,他们替人维权主要是自己受工伤后有了维权的冲动。但他们不是律师,却做着律师的事情,维权效果令人担忧。

据悉,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也曾被斥为“黑中介”。张治儒也曾被列为“黑律师”而被查。

还有质疑者认为,既是法律援助机构,就不应该收费。甚至有人认为,劳工 NGO 不过是打着公益的幌子谋取个人利益。

今年9月,由包括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劳动法学者等在内的20多位知名学者联名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公开信,声援深圳劳工 NGO。

公开信称,这些组织多年来致力于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理咨询、文化艺术娱乐、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如今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湖南火炬律师事务所罗律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劳动纠纷涉及法律程序繁杂,委托律师要先承受一笔不菲的律师代理费,这又使许多的劳动者望而止步。许多劳动者去当地申请法律援助,但法律援助需要审批,只有少数幸运者的申请才能得到批准,因此大部分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是得不到任何帮助或救济的,只能自己去维权。”

谈到未来的发展,张治儒表示,希望劳工 NGO 能够有合法的生存环境,能够在为劳工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劳工公益机构目前还处于生存的艰难阶段,确实还不知道今后的路会如何发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走一步算一步,边做边看吧。”

延伸

珠三角外贸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样本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这两三年来,珠三角一带的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多数中小企业困难重重,中小外贸代工企业更是举步维艰。”东莞一家小型外贸代工企业——星空制鞋厂的销售经理陈元日前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以东莞、深圳等为代表的珠三角无数中小外贸代工企业,无疑是组成“世界工厂”的核心部分。然而,欧美经济形势持续不景气导致代工企业订单下滑严重,再加上没有品牌,珠三角外贸代工企业陷入迷茫。抉择面前,外贸代工企业的转型成为最现实的话题。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马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国际宏观经济不景气和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影响,珠三角中小外贸代工行业经过几年的飞速发展之后,

开始进入了转型升级期。在这期间,不断上升的商务成本、愈加严苛的客户要求、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令加工贸易企业步履维艰,不少基础薄弱、融资困难的企业遭遇淘汰。

外贸代工企业,曾经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伴随着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一起成长,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和具有无品牌、不能分享品牌价值、低利润、低附加值等先天缺陷和不足的特点决定了外贸代工企业依赖性、抗风险能力差。

在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渐上涨的今天,外贸代工企业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我们以前给外企代工,根本不用考虑品牌和营销的问题,组织员工抓好生产就行,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东莞星空制鞋厂的销售经理陈元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从前年开始,他们企业就意识到产业升级势在必

行。

陈元介绍说,他们企业此前曾给金利来、百利先进品牌做过代工。在敏锐地意识到代工之路将走不长久后,公司开始了自创品牌、自主设计,并逐步缩小代工生产规模,减少对委托加工品牌的依赖。

“以前,我们90%以上的业务都是来自委托加工品牌,自打自创品牌后,我们经历了业务量急剧萎缩、利润大幅下滑甚至亏损数月靠借贷发工资的艰难。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自有品牌的建设、将重要资金用在购买设备上,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现在,公司只有不到5%的业务属于代工,但企业利润却是原来的三到四倍,且根本不用担心委托方撤单。”陈元说。

由于转型较早,现在陈元所在的公司已经彻底摆脱了委托加工品牌的依赖,并成功躲过了经济危机,实现稳步发展。

陈元还向记者介绍,在广东东莞代工鞋厂聚集地,像他们企业提早转型的并不在少数,目前正在努力转型升级的也不少。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广东正兴起一股来料加工企业转型潮,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从过去的 OEM 更多地进入 ODM(委托设计)模式,部分企业实现了 OBM(自主品牌)模式。在深圳,来料加工企业近半数成功转型。目前,深圳市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出口额占比已达到9.5%,加工贸易出口逐渐改变完全依赖外商投资企业的局面。

“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目前已经陷入困境,只有采取转型升级才能有效破解后继乏力的状态。需要进行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两方面的大转型,淘汰落后产能、由生产附加值低的产品转向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马遥说。

(应被采访人要求,公司名称为化名)